

日本政治史

第四册

〔日〕升味准之辅 著

商务印书馆

日本政治史

第四册

占领下的改革 自民党的统治

〔日〕升味准之辅 著

董果良 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政治史/(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郭洪茂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ISBN 7-100-01970-2

I.日… II.①升… ②董… ③郭… III.政治制度-历史-日本 IV.D7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583 号

Rìběn zhèngzhìshǐ

日本政治史

(全四册)

[日] 升味准之辅 著

董果良 郭洪茂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照排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1970-2/D·159

1997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970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41¼

定价:55.60 元

目 录

第 四 部

占领下的改革 自民党的统治

前言	839
第一章 占领统治 民主改革	853
一 占领初期 修改宪法	853
东久迩内阁、麦克阿瑟总部 天皇访问麦克阿瑟 币原内阁、 宪法修改问题 近卫的宪法调查研究 宪法问题调查会、麦 克阿瑟三原则 天皇为象征 放弃战争 立法者的悖论	
二 政党的复活 保守势力联立政权	891
政党的复活、进步党、自由党和社会党 整肃、一九四六年大选 释放政治犯、共产党 整肃鸠山、第一次吉田内阁 粮荒示威、 劳动攻势 二·一大罢工、“共斗”与共产党 中止罢工命令、 退一步进两步	
三 盟军总部与中道联立政权	927
策划自进社联立、民主党成立 一九四七年大选、片山内阁 煤矿国营、平野被整肃 芦田内阁、昭电案件 山崎组阁问题 美国改变对日政策、经济复兴	
四 各项民主改革	950
激进化和开倒车 撤销内务省、设置通产省 解散财阀、“经 团联” 农地改革、农民组合、“农协” 劳动组合、“产别”、 “总评”	
五 朝鲜战争 旧金山媾和	971

第二次吉田内阁、一九四九年大选 美苏冷战、反共堡垒 媾和问题、杜勒斯顾问 朝鲜战争爆发、三八线 中共志愿军、麦克阿瑟被撤职 媾和条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日本共产党

第二章 一九五五年体制 993

一 反吉田联合 民主党成立 993

撤销整肃、吉田派与鸠山派 改进党成立、重光与芦田 一九五二年突然解散议会、日黑会谈 一九五三年混帐解散议会、MSA 援助 反吉田联合、民主党成立

二 保守势力联合 日苏谈判 1013

鸠山内阁、保守势力联合 日苏谈判、鸠山与重光 日苏谈判与保守势力联合 一九五六年总裁选举中第二、三号候选者联合、石桥内阁

三 社会党统一 阶级斗争 1026

右派社会党与左派社会党 铃木派与和田派 西尾派、民社党 “总评”、阶级斗争 职场斗争、三池争议

四 日美新时代 改订安保条约 1041

岸内阁、日美新时代 警职法的修改问题 岸一大野密约 内阁改组、河野与池田 安保国会、强行表决 示威与罢工 艾克中止访日、自动通过 神话与恶梦的结构

第三章 经济高速增长 1071

一 收入倍增 地区开发 1071

一九六〇年总裁选举 池田内阁、收入倍增 通产省与大企业、自由化问题 地区开发、新产业都市建设促进法 一九六四年总裁选举、池田第三次当选

二 社会开发 冲绳归还 1091

池田裁夺、佐藤与河野 佐藤内阁、黑雾 居民运动、公害立法 冲绳归还谈判、纤维问题 一九六九年大选、冲绳问题 国会 后继人问题、福田与田中

三 自民党统治体系 社会变动 1118

派阀、官职分配 国民协会、绢手帕、土地炒卖 个人后援会、
新潟三区越山会 补助金与请愿、利益分配体系 大众社会
状况、大众传媒

四	劳工运动 社会党	1143
	“总评”、春斗 技术革新、金属劳协 社会党、结构改革派 江 田设想、派阀抗争 议员政党、依靠工会	

第四章 自民党统治的变形 1161

一	日中恢复邦交 列岛改造	1161
	一九七二年总裁选举、田中内阁 日中邦交正常化 列岛改 造、石油危机 金权政治、拉企业助选 《文艺春秋》十一月 号	
二	净化政治 洛克希德事件	1181
	椎名裁夺、三木内阁 净化政治、修改禁止垄断法 洛克希德 事件、逼三木下台 大福密约、一九七六年使党分裂的选举 福田内阁、总裁预选 大平内阁、一九八〇年众参两院同日选 举	
三	利益分配体系 大众社会状况	1209
	利益分配体系、地方自治体 “农协”、中小企业团体 大众社 会状况、革新首长 社会党、在野党联合	
四	第二临调 战后政治总结	1224
	铃木内阁、再建财政 第二临调、不增税的行政改革 预选总 裁、中曾根内阁 一九八三年大选、田中的余威 审议会方 式、大众传媒政治 一九八六年众参两院同日选举、“灰色区” 销售税风潮、中曾根政治的总结	

参考文献	1256
作者后记	1265
附表	1266
人名索引	1274

第 四 部

4

占领下的改革 自民党的统治

前 言

以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目的的占领统治，其丰碑是使日本制定了规定天皇为象征和放弃战争的日本国宪法。币原喜重郎内阁，为了从战胜国对天皇制的攻击和对军国主义复活的畏惧中救出天皇，不得不以悲怆的心情接受了把非军事化和放弃战争贯彻到底、使民主化达到把天皇作为象征的麦克阿瑟宪法草案。按《波茨坦公告》，日本的政体将决定于“日本国民自由表示的意思”，但麦克阿瑟先于日本国民自由表示意思而强行草拟了宪法。他完全是卢梭式的“立法者”，也太喧宾夺主了。

占领下的改革，及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所有领域。惩办战犯和革除公职，使战争时的领导者一扫而光。三井、三菱和其他财阀被拆散或化小了。府县的知事改为公选，撤销了内务省。经过农地改革，地方名望家层的残基完全崩溃了。另一方面，政治犯被释放，左派工人运动发展起来了。因此，民主改革动摇了原来的国家体制的根基。第三册所述的曾经支持昭和初期的政党政治的诸条件（由财阀提供政治资金，依靠内阁官僚制维持选举地盘，地方名望家层发挥拉票职能，无产阶级政党软弱无力）也消失了。这是⁵战后复活了的政党政治的初期条件。

到战败当年的年末，战前曾经存在的一些政党，经过改组，更换名称，又复活了。战时议会的议员们，寄望于“复活和强化民主主义的倾向”这一占领下的改革的目标，把大日本政治会解散，于11月建立了日本进步党。参加的议员有273名。在纲领中提出维护国体。在战时议会中受到压制的少数派，以旧政友会干部鸠山一郎为中心，在11月成立了日本自由党，参加的议员有43名，但团结坚强，声望也高。这个党也在纲领中强调维护国体。再有，产业组合(工会)运动方面的议员，以修正资本主义和发展协同组合(生产合作社)为纲领，在12月组织了日本协同党，参加的议员有26名。另外，无产党的各派(除去共产党)，也在11月合并为日本社会党，参加的议员有17名，但领导权掌握在西尾末广等右派手里。其纲领没有提到天皇制，但是采取了使天皇制民主化而继续下去的方针。

各政党这样产生出来以后，帝国议会修改完选举法(妇女有参政权，实行大选区多名连记制)便解散了。但盟军总部下令延期举行大选，并在第二年1月砸下了整肃(革除公职)的铁锤。整肃超过了预想，范围甚广，特别使进步党受到毁灭性打击。在4月举行的大选中，当选者有81.8%为新人。按政党来区分，在总数为466名的议员中，自由党141名，进步党94名，社会党93名，协同党14名，共产党5名，无党派119名。

指导民主改革的盟军总部民政局，对战前的保守派政治家掌握政权不够满意。币原内阁虽然顺从了占领政策，但被认为有隐蔽的抵制和反抗。在大选中获胜成为第一大党的自由党的鸠山内阁
6 刚要成立，盟军总部民政局砸下了第二铁锤，把鸠山作为“不受欢迎的人物”整肃起来。从鸠山手中接下自由党和政权的吉田茂的自由、进步两党的保守联立内阁，在民政局看来也是很保守的。

另一方面，共产党在盟军总部看来是民主化的催化剂。使“在

狱中十八年”的德田球一等获得解放的，是盟军总部。念念不忘《三二年提纲》^①的他们从狱中出来，称赞占领军为解放军，号召“打倒天皇制，建立人民共和国”，对惊魂初定的原有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现在有了说辞。“亡命16年”从延安回国的野坂参三同他们汇合，提出“占领下和平革命”路线。共产党在全国饥馑和混乱状态之中扩大工人的生产管理和大罢工运动，掌握了全日本产业别劳动组合会议（“产别”）的领导权，积极准备发动1947年二·一罢工。按照共产党的判断，二·一罢工的目标是打倒吉田内阁，而不是反对占领统治，盟军总部对吉田内阁并不满意，而如果盟军总部直接出面干涉，则表示占领统治的失败，所以盟军总部不会下令中止罢工。

但被迫作出抉择的盟军总部，下令中止大罢工。于是，盟军总部开始对共产党的挑动活动加以压制，支持“产别”系统工会内出现的反民主化运动。另一方面，指示未能阻止大罢工的吉田内阁提前大选，采取了强化可以与自由党对抗的第二保守大党的政策。其结果是成立了民主党。大选的结果合乎民政局的期望，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成立了社会、民主、国协（国民协同党）三党的中道联立内阁。片山哲内阁和芦田均内阁之所以能在不断内讧和屡发渎职事件之中维持了政权，就是因为有民政局在后面支持。

于是，民政局依靠万能的占领权力促进了民主改革，庇护了中道联立政权。这里潜在的根本性矛盾，是依靠专制权力进行的民主化。1948年，这个矛盾之上又覆盖了一个矛盾。这就是随着美苏冷战的深化和中国大陆的共产化，美国的对日政策由改革转向复兴，使日本担负起防共防波堤的使命。一直促进民主化的民政局的领

① 《三二年提纲》，是1932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制定的日本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全称为《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其中规定日本革命的当前性质是“具有向社会主义革命强行转化倾向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译者

导力减弱，芦田内阁下台，吉田内阁再上台。盟军总部又换上吉田内阁，无非是想改变政策。1949 年大选中民主、自由两党获得大胜时，两者的提携便确定下来。民主改革遭到“开倒车”逆流的冲击。即占领当局放弃了解散财阀和排除生产集中的政策，而强化了对共产党与左翼势力的排斥和压抑。这股逆流又被朝鲜战争的爆发所促进，并导致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缔结。这块占领结束的丰碑与占领改革的丰碑砌合不齐，直接反映着美国对日政策的改变。占领结束后的日本政局，以这两块砌合不齐的丰碑为前提而开始了。使独立后的政局动荡不安的因素有二。第一，是吉田派与反吉田派的对抗。解除整肃后重返政界的战前派大党人（鸠山、三木武吉、河野一郎等）和大官僚（岸信介、重光葵等），结成反吉田联合军，胁迫吉田首相下台。吉田首相要把他制造的两块丰碑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即试图实行在不修改宪法、不重新武装和由美国保证日本安全的基础上复兴经济和扩大贸易的路线。而以鸠山为首的反吉田派的大多数人，则举起要求修改两块丰碑的旗帜，即要求修改宪法和重新武装，要求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和与美国对等化。双方的攻防战，到 1954 年秋吉田政权垮台和鸠山民主党内阁成立，方告一段落。

第二，是保守派与社会党的对抗。左派社会党以拥护宪法、反
8 对重新武装、废除安保条约（即坚决维护日本民主化的丰碑，废弃占领结束的丰碑）为标榜，依靠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总评”，它是在盟军总部的指导下建立，并以朝鲜战争为契机而急速向左转的）的全面支持，在相连的几次大选中增加了议席，开始凌驾于右派社会党，而为了掌握政权便在 1955 年秋同右派社会党统一起来。民主党和自由党为了同社会党对抗和保卫保守性政权，便合并而成立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它们的合并，史称“保守合同”即保守势力联合）。因经济复兴和朝鲜战争而苏醒过来的财界大企业，为求政局安定，在背后对保守势力联合施加了强大压力。

于是建立起一九五五年体制。自民党和社会党在众议院的席位占总席位的 97%，两者的力量对比为 2：1。从这个体制成立的经纬来看，这不外是自社两党的、而实质上是财界大企业与“总评”的对抗体制。50 年代是“阶级斗争”的时期。想要恢复经营权和向生产合理化进军的大企业与反对它们的“总评”所属组合（工会）之间，在全国各地连续发生了大规模的炽烈争议。争议的顶峰是围绕煤矿合理化而发生的 1950—1960 年间的三池（煤矿）争议。

政治对抗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岸信介首相举起“日美新时代”的旗帜，试图以条约对等化来强化日美关系，以修改安保条约。但以“总评”为首的动员组织和大众传媒的报道，使规模空前的群众拥集到国会周围反对岸的试图，而受到这一局面激励的社会党便强硬起来。另一方面，自民党反主流派也叛背主流派，结果使条约自然被承认，未能修改，但艾森豪威尔中止了访日，岸内阁垮台了。我们可以称此为安保改订型政治过程。反吉田派的战前派党人和战前派官僚的政权到此终结，吉田派的战后派官僚（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的时代由此开始。即反吉田派结成的自民党由吉田⁹派接替下来。

池田首相把政治上的争论问题暂时搁置起来，眼光转向经济，打出“收入倍增”（国民收入成倍增长）的旗号。在政治对抗背后进行的经济高速增长，由此正式开展起来。一九五五年体制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促进体制。占据促进体制的中心的，是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占领下的民主化使内务方面的官僚遭到整肃，把内务省撤销，而经济方面的官僚却是占领统治的不可缺少的帮手。他们先在战败后的经济混乱中发挥了作用，后在经济复兴中又增强了他们的作用。为振兴出口、使产业合理化和经济自立而在 1949 年设立的通产省，以外汇配额制为武器将技术、资金和材料集中用于有前途的企业，通过行政指导对生产进行调整，对倒闭和破产企业

实行救济措施。把这些产业政策视为救生索的大企业，勇敢地向有风险的项目进行了挑战。因此，当 1956 年的《经济白皮书》宣布“已非‘战后’”时，除钢铁、机械、化学等原有产业有所扩大外，从石油化学到电子工业等新兴产业也走上发展的道路，并在太平洋沿岸地带陆续开建大型联合企业。

在促进体制中，自民党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依靠官僚出身的议员的行政财政能力和财界的政治捐款而维持的自民党长期低落不振，只是由于它在国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才保住了政权和保证了经济方面的省厅与财界大企业的活动自由。不，这样说并不正确。党内派阀的斗争，倒是发挥了惊人的搅乱作用。以选举总裁为主的权力争夺，不仅引起了政局的混乱，而且还介入了省厅的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这个无底的钱包不断吞食财界资金。

10 派阀是从总裁(首相)开始到政府、国会和自民党的官职的分配单位。一般说来，越能获得大量官职的派阀越能膨胀，而越膨胀则获得官职的能力也越增大。派阀也是政治资金的分配组织。越能筹集大量政治资金的派阀越能膨胀，而越膨胀则筹集资金的能力也能增大。派阀还是为扶植所属议员的选举地盘而张罗补助金和提供其他便利的互助组织。张罗补助金的能力大的派阀日益膨胀，而越膨胀，其张罗的能力也越增大。于是，派阀以获得官职、筹集资金和扶植地盘为契机形成起来，自民党的大部分议员不是属于这一派阀就是属于那一派阀。派阀有其所属议员的名册，设立派阀事务所，召开定期集会，发行机关报。派阀的制度化由岸内阁时代急速发展，多次消除派阀的运动均以无效告终，以致已经没有人认为能够消除派阀了。

另一方面，在 60 年代初，还形成了以获得补助金等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体系。从 50 年代开始，一些全国性的和地区性的利益团体就已相继建立，请求补助金的陈情书像雪片一样飞到

有关的省厅和国会。有关的省厅为了确保和扩大各自的影响范围,一方面把既成的利益团体作为补助金的承接单位,另一方面又促进建立起新的承接团体。国会议员也为了强化各自的选举地盘而竞相协助陈情,向有关的省厅施加压力,在自民党政调会和两院委员会中加强活动。于是,形成了有关省厅的权限、利益团体的利益和国会议员的地盘三者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多元利益分配体系。

利益团体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财界大企业虽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但与选票没有直接联系。拉票还要多靠“农协”(农业协同组合)和中小企业团体。但是,扶植地盘的最有效办法,是为地方自治体布置开发当地的公共土木工程。当地一掀起开发的热潮,地盘¹¹立即会扩大和巩固。池田内阁的地区开发政策,促进了这种利益分配体系,并使其全面发展。自治体等利益团体、当地国会议员、有关省厅互相携起手来,像狮子一样分别为当地利益、选举地盘、管辖权限而争夺。地区开发就是吸引人们建厂和整備建厂条件,所以财界大企业举双手赞成。于是,政治一下子土建业化了。可以称此为地区开发型政治过程。

地区开发型政治过程,与“总评”工会和大众传媒鼓动群众拥向国会周围的安保改订型政治过程完全不同。后者是关于政治主义争论的大众动员,前者是利益团体的争利主义的陈情运动。但陈情运动也是大众动员的一种。这里虽然没有手持红旗的工会会员和头戴防护盔的“全学联”(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成员,但有自治体干部和地方议员受有关省厅的指示在当地国会议员的带领下于永田町^①的街头走来走去。小型的地区开发型陈情活动,通常次数很多,而且反复进行。可以称此为日常政治的脉搏。因此,一

① 永田町,在东京都千代田区,国会议事堂、首相官邸,议员会馆均在这条街上。——译者

到活动的时候，头上扎着白布手巾的“农协”干部和农民，身上斜挎着红带子的纤维业者们，就被号召来到国会和官厅周围。多元的利益分配体系的内部倾轧虽多与自民党的内讧有关，并经常刺激这种内讧的产生，但自民党只要能使利益团体成为拉票地盘就可保持住多数派的地位。

到 60 年代后半期，经济方向的省厅、财界大企业、自民党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第一，在通业省的保护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大企业，自己有了充分的自立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再需要通产省的保护扶植了。产业政策由政府主导型转为民间主导型。当然，并不是不再需要政府的支援，因为外汇和对外贸易是与政府的对外政策不可分的。第二，自民党没有省厅的知识和工作经验，没有制定法案和编制预算的能力，是无法进行统治的，但在政治过程中省厅自有的整体指导力开始分裂，而一直依靠这种指导力的自由党则强化了它的决定权。

决定权由省厅转到自民党，可能是利益分配团体施加压力的结果。即利益团体、有关的省厅、有关的议员（特别是结帮的议员）构成的三位一体的多元膨胀压力，打破了大藏省的均衡预算主义，使大藏省失去编制预算的主导权，把调整互相竞争的压力的工作交给自民党政务调查会，而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如果调整不了，则要交党的三要员^①或内阁会议去作决定。

在同一时期，自民党内的官僚派开始失去优势。官僚派在行政财政的知识经验方面强于党人派（非官僚出身者）。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需要官僚派。但是，党人派通过 10 多年的议会活动和同省厅打交道当中，也获得了不亚于官僚派的知识经验。官僚派在 10

^① 党的三要员，因党而不同。在自民党内，指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在社会党内，指中央执行委员长、副委员长、书记长。——译者

多年的议员生活中，也必然沾染上党人派的气质。两者通过混合和交流，经验上的差别开始消失。至少养成了在进入国会前没有的凭议会的经验判断事物的能力，只是这一点就使出身的差别失去了重要性。1964年和1965年大野伴睦和河野一郎相继死去后，党人派便消失了。而在1972年佐藤首相下台后，官僚派的支配也告终了。

田中角荣的上台，标志着官僚派的终结。田中代表着官僚和党人的混合。从经历上来说，田中确是党人，但他有非凡的记忆力和计算力、调整力和实行力，但没有大野或河野的那种令人讨厌的官僚气。他优待官僚，倾听他们的意见，深受他们的信赖和寄望。他是一位能够操纵运用官僚的党人。他也是经济高速增长和地区开发的骄子。他极其巧妙地适应开发的热潮，大力推进这一热潮，从事地产投机和开办皮包公司获得巨款，在用这笔款使政界土建业化的同时不断向政界的高峰攀登。他在利益分配体系的各部门张网而创造了所谓“综合医院”。他在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论”，击败正统的后继者而夺取了政权时，经济高速增长达到了顶峰。¹³

经济高速增长虽然建立了利益分配体系，但也同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变化，促进了大众社会化。标志大众社会化的惊人进展的，是产业人口构成的变化。第一产业人口的比重，由1955年的41%锐减到1970年的19.4%。在这期间，第二产业人口的比重由23.5%升到33.9%，第三产业人口的比重由35.5%升到46.7%。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人口稀少地区扩大，而城市则过密化，社会关系趋于流动化、多元化和原子化。生活水平向上，生活中等化扩大。人们从传统的动员网脱离，退向个人生活、家庭和享乐，养成不关心政治和满足现状的态度，使无党派层急增。另一方面，大众传媒急速发达，电视压倒了广播。电视普及率由1955年的0.9%增加到1970年的94.7%，几乎达到了饱和点。大众传媒浸蚀着传统社

会的名望家层的动员网，同时又成了动员城市的浮动层的武器。

但是，退向个人生活，对现状持满足的态度，也可能因情况而转变为保卫生活的积极行动。从 60 年代后半期扩大起来的以公害、环境破坏为争论焦点的居民运动，就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1964 年佐藤批判池田首相的经济高速增长政策而提倡“社会开
14 发”，是有预见性的。公害和环境破坏虽然是高速工业化带来的争论焦点，但由此引起的居民运动的形态也反映着高速工业化所促进的大众社会化。这种大众动员既不同于安保骚动的群众游行示威，又不同于地域开发的陈情运动。即公害不是特定职业阶层的利害，而是超阶层的，涉及一个地区居民全体的生活。运动由一些能够收集有关争论焦点的情报、挺身出来作战而有富裕时间的非专业积极分子随机领导。领导者不固定，也非专职。参加者也不始终固定，随时随地增减。从运动的中枢到外周都有很大的流动性，很难制度化。运动虽然是以地区的特殊的争论焦点单独地、分散地发展起来的，但经大众传媒报道和记者支援，可以诱发其他地域的争论焦点和运动，互相影响与刺激，而形成一个整体发生强大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地方自治体的招引工厂运动开始转向驱逐工厂，而“公害国会”（佐藤内阁）在 1970 年便制定了许多关于限制有公害的企业的立法。我想称此为公害立法型政治过程。

从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前半期辈出的“革新首长”，是与反对公害运动同质的运动的产物。革新首长大多数都无党派，提出市民本位和与居民对话的口号，攻击自治体行政为自民党和企业利益服务而不甚关心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以动员城市里的浮动层。现场的选举运动和大众传媒的报道，产生了非常大的效果。革新首长拟定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在进入低增长期时使自治体的财政陷入困境，但反而促进自民党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福利对策，在这一部门扩大了利益分配体系网。

另一方面,被置于自民党利益分配体系之外的社会党和“总评”,也受到高速工业化和大众社会化的激励。随着技术革新的进¹⁵展,主要的产业工人的执勤形式和劳动形式发生变化,以前的共同作业的重体力劳动,为使用监测仪器的单独作业的脑力劳动所取代。由于蓝领工人的白领化和生活的中等化,工会的组织和活动也不得不改变。“总评”虽然还举着“阶级斗争”的旗帜,但实际上已开始向“劳资协调”转变。围绕煤矿合理化进行的三池争议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在1960年夏告终,而由1955年开始的每年“春斗”,虽然参加的工会急增,但斗争的声势逐年消减,从日益扩大的经济增长这张馅饼上分得了自己的一份儿。1964年,随着向开放经济转变,应付金属产业的国际竞争的激化,而公然否定“阶级斗争”,打出“劳资协调”的旗号,以造船、化学、钢铁部门的工会为中心成立国际金属劳动组合联合日本协议会(简称“金属劳协”),开始出现劳动战线改组的动向。工会日益利益团体化,“总评”和社会党的社会基础倒退了。

60年代在社会党内兴起的“构造改革”论,为因应高速工业化和大众社会化而试探改变社会主义路线,但在没有具体实行以前,就立即卷入党内的派阀斗争,引起党内左派和“总评”的反驳,而没有收到任何成果,于是社会党的力量逐渐低落,到60年代末已经不是可以同自民党抗衡的势力了。如果说一九五五年体制是自社两党垄断议席(两者的比例为2:1)的体制,那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体制到这时便不复存在了。

如果说一九五五年体制是高速工业化始发期建立的政治体制,那末它在高速经济增长期的成熟期的表现,可以说是执政党和在野党相伯仲。1973年的石油危机,不只是使田中首相的“列岛改造”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日本的经济由此进入了低增长期。在这个时期,大众社会化达到了饱和状态。第一产业人口的比重,1975¹⁶